

及的历史，而且污蔑社会主义国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变种”。为了揭露这部“学术著作”的欺骗性和反动性，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世界史学者撰写论文，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谬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包括世界史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不能失语。不久前病逝的吴冠中先生曾说：“走上艺术的路，就是要殉道，还需要痛苦，而我的心永远被苦缠绕着”。^①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需要殉道者的精神，要时刻牢记自己平凡而又崇高的使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工作，在科研工作中开拓创新、锤炼自我，努力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责任编辑：姚玉民〕

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周年

汤 一介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他又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要求我国56个民族共同来建设的“和谐社会”。我今天想讲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和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之间有什么关系。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在没有文化传统的空地上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复兴，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自远古就有着社会和谐的追求，《尚书·尧典·虞书》中说：“协和万邦”，即要求天下万国和谐相处。至孔子而有较为系统的建设理想社会的蓝图，《礼记》的《礼运》篇中，记有孔子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

① 韩小蕙：《文艺·人生·时代——从吴冠中现象看文艺家与时代的辩证关系》，《光明日报》2010年8月5日。

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所提出的这一套理想社会的蓝图，确实有一种“和谐社会”的样子。可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条件下，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种“空想”，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美梦”。而且其中还包含着与现代社会相背离的因素，例如它包含着“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从古至今，正是一些仁人志士在努力追求着理想的“和谐社会”，才给人类社会以希望。在儒家发展的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大儒”在提倡着孔子理想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重视这份宝贵的遗产。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处于极其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关系之中。人类社会如何从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之中找出一条出路？在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从人类的历史文化智慧中找出一条世界健康合理的“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这无疑是各国人民所希望的前景。“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等等，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① 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经历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

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文化是否会有新的飞跃？雅斯贝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华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而民族的复兴要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精神支柱。毋庸讳言，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就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以“和谐”的观念贡献于人类社会。

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趋势，进入 21 世纪，这种趋势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修养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老子》等等的有关课程。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等等。这一潮流，也影响着我国的高层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对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才能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人民也开始对中国文化重新认识，200 多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儒学经典被译成各种外国文字，无疑可以说是儒学在“新轴心时代”得以“复

①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14 页。

兴”的明证。我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必须在吸收其他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复兴”，必须在深入发掘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以贡献于人类社会中兴，当然也必须在努力寻求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资源中“复兴”。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而努力。

当前西方某些有理想有智慧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有益于今日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资源。例如法国当代大儒汪德迈曾说：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以降的挑战，已经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提倡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的思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这里他提出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对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是很有意义的；第二是中国“远神近人”的思想要求宗教应更加把注意力放在“人”自身的问题上；第三是中国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见于《论语》）的博爱精神。这三点可以说都和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有关。又如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说：“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儒家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人’，这是否可用来修正和加强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在一个以‘礼’建构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发现可利用的资源，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哲学根基不足却颇富实际价值的人权观念？”^①这段话中可以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想法：中国的“礼”是否可以补足西方的“颇富实际价值的人权观念”。汉朝的贾谊给皇帝写了一份《陈政事疏》，文中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看来，“法治”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辅之以“礼”，对社会的安宁与和谐会更有意义。因此，我有一个想法：“礼法合治”也许更适合我国社会的需要。

当前，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哪些阻碍我们实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重大问题？我认为也许“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制约着“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近一二百年来，由于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吸毒、自杀、杀人，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身心内外”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无疑是人类要面对的最大课题。其中“人”的问题是关键。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自身造成的。

针对上面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若干有益的思想资源。

（一）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1992年11月16日，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说：“人类和自然界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种情况的造成不能说与西方哲学曾长期存在的“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没有关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它完成了或者说

① 该书中文译本为《孔子哲学思微》，蒋戈为、李志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段文字见该书《中译本序》，译文略有改动。

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与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和物质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不牵涉另外一个。”^① 这就是说，在西方哲学长期把“天”和“人”看成是相互独立的，研究“天”可以不牵涉“人”，研究“人”也可以不牵涉“天”，这可以说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但进入 20 世纪，西方哲学有了很大变化，已有西方哲学家打破“天人二分”的定式，如怀德海^②）。而中国“天人合一”是说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周易》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就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的书，也就是说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郭店楚简·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对如何了解“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有段话很重要，他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③ “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责任。“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是统一的。^④ “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所以《周易·乾·象》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即是说“天”与“人”是联系在一起的持续发展着的“生命的共同体”。“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所以“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应该说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二）“人我合一”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即人与人的关系是由情感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应该“推己及人”，也就是说应该由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91 页。

② 《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刊于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 年 8 月 15 日）中说：“（怀德海）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中构成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认为应该把环境理解为不以人为中心的生命共同体。这种新型生态伦理，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过程哲学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之根，因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非二元论，是对现代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而怀德海有机整体观念，正好为它提供了进行这种批判的理论根据。”可见，现代一些西方哲学家已经对“天人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做出反思，并且提出了“自然”与“人”构成“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的观念。

③ 《朱子语类》卷十七《大学四·或问上》。

④ 康德的墓志铭上写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愈使心灵充满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们上之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是不是说，康德也认为应对“天”有所敬畏呢？这和孔子的“畏天命”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呢？

“亲亲”扩大到“仁民”以及“爱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① 所以《郭店楚简》中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爱人，仁也。”如果把爱自己的亲人扩大到爱他人，那么社会不就可以和谐了吗？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把“亲亲”扩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在《论语》中虽然没有出现“仁政”两字，但其中却处处体现着“仁政”思想，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举贤才”、“泛爱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等等都是讲的“仁政”。孔子的继承者孟子讲“仁政”，意义也很广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对老百姓的道理，要使老百姓都有一定的固定产业，他们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固定产业，怎么能让他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呢！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我想，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自己固定的产业，过上安康幸福的生活。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和相互爱护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该是有意义的。

（三）“身心合一”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应该有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庸》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社会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养是以符合不符合“道”为标准，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的一贯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修身近至仁。”修身是达到“仁”的境界的必有过程。因此，儒家讲“修身”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希望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社会上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这个社会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世界”了！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成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如果人能达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那么他不仅与“他人”（社会）和谐了，与宇宙和谐了，而且“自我身心内外”也和谐了。孔子有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修身”的座右铭，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意思是说，不修养道德，不讲求学问，听到合乎正义的话不能去身体力行（实践），犯了错误而不能改正，是他最大的忧虑。孔子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并不容易，那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为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讲学”同样不容易，它要求人们天天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这样才可以负起增进社会福祉的责任；“徙义”是说人生在世，听到合乎道义的话应努力跟着做，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把“公义”实现于社会生活之中；“改过”是说人总是会

① 见《孟子·尽心上》。《中庸》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可以视为孟子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开展。因此，孔孟之“仁爱”学说，不仅可以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这样才可以成为合格的人。“修德”、“讲学”、“徙义”、“改过”，是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这就要求“修身”，以求得一“安身立命”处。^①

在儒家看来，要解决上述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的思想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做出它可能做出的贡献。

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作为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责任编辑：魏长宝〕

财富伦理引论

——为庆祝《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周年而作

唐凯麟

《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30年来，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高水平、广视野、前沿性和原创性为办刊特色，团结和推动中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拓创新，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艰苦探索和锐意创新，成为深刻反映学术前沿、时代精神和中国经验的权威阵地，展示中华民族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智慧的重要窗口，培养新人、壮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重要摇篮。作为她的忠实读者，也作为一名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以来所做的巨大贡献，笔者深受其惠。故在她创刊30周年之际，笔者不揣冒昧，把十几年来对财富伦理所做的一点理论思考整理成文，以资庆贺。

（一）财富伦理的基本内涵。财富伦理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它是人类在认识、创造、支

① 朱熹《四书或问》中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乖错。其间一国一家，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盖人生在世，必有一“安身立命”之原则和境界。

ABSTRACTS

(1) Thirty Years of Pub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Academic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Yu Wujin et al. ° 4 °

Editor's Note : 2010 marks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founded in January 1980).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is journal has been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authoritative locu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an in-depth picture of cutting-edge scholarly achievement,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Chinese experience, and to being a high quality platform promoting the flourishing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displaying the contemporary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 wisdom of world-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ith its consistent encouragement of original works by new autho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has attracted large numbers of like-minded scholars and become a nursery for leading researcher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mmemoration of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the editorial office has organized a special issue on the topic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nd Academic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mong others, Professor Yu Wujin from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of Fudan University has used his own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to look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is journal in creatively advancing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He trusts that as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foremost theoretical journal in China, it will make a still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hip. Professor Gu Hailiang, President of Wuhan University, addresses the necessity of and pathways to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 modern society and expresses the hope tha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will undertake new initiatives in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cros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fessor Wang Shaogua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ffers a review of the thirty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He holds that after the stages of "learning," "imit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China's political science should take a further bold step toward localization. By the tim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celebrates its sixtieth anniversar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tists should be producers and exporters of concepts, methods, theories and ideas. Research Fellow Yu Pei from the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of CASS argues that during the thirty-plus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world history research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change, from translation, compilation and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independent and in-depth research. The intellectual force and character of the times reflected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re of fundament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academic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fessor Tang Yiji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Peking University explor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of Confucianism's dominant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ccording to Tang, it is impossible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without cultural tradition as a basis. Our present study of Confucianism should absorb and utilize the Confucian mode of thinking, life wisdom and other valuable idea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tellectual pathway and worthwhil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human society. Professor Tang Kailin from the Center for Studies in Moral Cultur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explor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ethics of wealth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research on this topic, which he believes will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moral shortcomings arising from the unregulated character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promote healthy and orderly economic operation. Professor Xu Xianming, President of Shandong University, discusses some normativ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 he holds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be mark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xcellence, intellectual depth, innovation and uniqueness.

(2) The Marxist Theory of Justice : Basic Dimensions and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Ma Junfeng ° 44 °

In the wide-ranging discussion of social justice issues, the theori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hinkers such as Rawls, Nozick, Hayek and MacIntyre are repeatedly cited and expounded. By contrast, for various reasons, classical writers like Marx and Engels have been overlooked or even forgotten. Without a concret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ntext, it is hard to grasp the true attitude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views of Marx and Engels on social justice. We might even conclude not only that they had no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but that they opposed and rejected approaching questions from this angle. As a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enabling the proletariat to know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and liberate themselves and mankind, Marxism is a theory that unites truth and value.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justice as an expression of value is only possible when the dimensions of science and value are dialectically combined. On the one hand, justice is a value concept that functions as a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 on the other, it refers to an actual stat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s (including interests, opportunities and rights) that inevitably involv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between formal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the conflict betwee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opposi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injustice and so on. Only a dialectical mode of thinking can ensur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justice issues.

(3) Ryazanov and MEGA1

Zhao Yulan ° 58 °

David Ryazanov laid the foundation of MEGA1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the historico-critical edition of all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n available. He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cause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ir works, manuscripts and letters. Even before the MEGA1 project he had already proposed a "Vienna Publishing Plan" and independently edited and published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 1852-1862*.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provided him with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publis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edition of MEGA1. His efforts not only brought to light a great many writings that might otherwise have been lost but also laid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MEGA2.

(4)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Method and the Life Realm : Some Thoughts on Feng Youlan's Philosophical Method

Li Jinglin ° 66 °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ers, Feng Youlan had the greatest degree of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In his earlier years, he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e formalist meaning (not touching on content) of metaphysical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and defined the negative method too narrowly, leading to some theoretical confusion over the inherent unity of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method. In his later years, he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the concrete